

評《國家為何會失敗？
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Acemoglu, Darson, et al, 2012, NY: Crown Business.

劉雅靈 黃富娟

劉雅靈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ylliou@nccu.edu.tw) 。黃富娟 政治大學社會學所
博士候選人 (florihuang@yahoo.com.tw) 。

Yia-ling, Li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Florenca Fu-chuan, Huang,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2012年Acemoglu與Robinson兩位學者出版了*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引發西方學界對於國家為何富裕與貧窮的論戰。臺灣也於2013年出版了中文譯本。該書作為一本發展史的著作，關注當前國家發展貧富不均的歷史根源，研究取向凸顯「制度的歷史角色」（historical role of institution），並強調權力與政治過程推動政治與經濟制度改變的重要性，因而與社會學產生了「選擇性的親近」（elective affinity），也拉進了與社會學對話的可能性。

評論本書，是基於社會學者對於國家發展落差與社會貧富不均的長期關懷，也是對人類發展處境與生存狀態的內省。在閱讀這本歷時十五年研究、深入淺出地描繪自新石器時代到當前社會發展的制度變遷，倘伴於浩瀚知識書海，恐無法逐一回應書中諸多細節並做到精闢入裡的評論。但在秉持對知識開放性的前提下，期盼透過閱讀反饋來投石問路，開啓與其他學科觀點之間的對話。因此有了撰寫書評的想法。以下，本文從回應《國家為何會失敗？》提出的廣納制度理論（inclusive institutions）出發，檢視並評析理論引發的學術論戰，在初步總結之下，反思其對發展社會學的可能貢獻。

二、《國家為何會失敗？》：理論觀點的回顧

Acemoglu與Robinson（2012）在「歷史制度論」（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的架構下，從耙梳人類歷史過程中的制度變遷，旁徵博引重要的國家發展個案和「關鍵時期」（critical juncture）產生的制度變遷，來說明當前國家的富裕與貧窮落差。他們從歷史事件的發生序

列開始，以「關鍵時期」說明國家之間的初始制度分歧如何在第一時間發生，並經由長期「制度漂移」（institutional drift）¹，促成制度的延續與變遷。他們強調制度在「關鍵時期」造成的小差異，經常是歷史偶然（historical contingency）的結果，如黑死病在歐洲中世紀造成人口死亡的地區差異。因此提高了「歷史」與「偶然」在理論中的分量。

在反駁「地理」、「文化」與「無知」等假說時，Acemoglu與Robinson（2012）提出「廣納」與「榨取」制度（inclusive/extractive）的對立概念，配合「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互動，來說明制度協力效果對於國家發展的影響，隱含某種類型學的歸納（表1）。他們主張，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相互支持，會形成正向或負向的「反饋迴圈」（feedback loop）來影響國家經濟發展，隱含同意「制度互補」（institutional complementarities）概念與經濟表現之間的因果關係（Hall and Soskice 2001: 17-21）。

他們主張，當前富裕國家是因為採取了「廣納政治制度」²與「廣納經濟制度」³，並將英國視為論證的「理念型」（ideal type）。英國在光榮革命（1688）之前，由於王室無法有效控制大西洋貿易的獨佔權，

¹ 新舊制度因素的混合、堆疊與覆蓋。

² 「廣納政治制度」的兩個要素，「政治集權」（political concentration）與「政治多元化」（political pluralism）。前者，是指國家擁有集中化的權力來落實政策的推動與資源配置；後者，強調社會群體擁有政治參與途徑且權力是廣泛分配於多元群體，以有效節制政府權力的無限擴張。

³ 「廣納經濟制度」，是在「廣納政治制度」上形成，指廣泛的社會群體有參與和分享經濟資源的機會，並由市場提供一套公平法律來保障個人勞動權與私有產權不受侵犯。廣納經濟制度會誘發自由個人專注於生產、投資與創新研發的經濟行動，並促使市場走向開放多元、催生「創造性破壞」來引導國家走向持續性的成長。

表1 制度與國家發展的類型學：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協力效應

	廣納經濟制度 (良性循環)	榨取經濟制度 (←↓)
廣納政治制度	英國、美國、澳洲與日本 (1700-1800)	- ⁴
榨取政治制度	(↑→) 蘇聯 (1928-1970) ⁵ 中國 (1978-) ⁶ 北韓 (1949-2013)	(惡性循環) 非洲、拉丁美洲 (1400-1800) 非洲、拉丁美洲 (1900-1990) ⁷

資料來源：改編自Acemoglu (2011)，本文彙整後加入個案說明

造成貿易利益廣泛分配在新興社會群體之間。⁸ 後者組織輝格黨 (Wig Party) 進入國會，制衡王權政治力量的擴張。這種政治改革與權力節制的法治基礎，反饋到經濟體，逐步創造一個公平且廣納的市場，利於形成「創造性破壞」 (creative destruction) 來催生工業革命的發生。自此，英國的政經制度步上正向反饋的「良性循環」 (virtuous cycle)。⁹

⁴ 廣納政治制度不支持榨取型經濟制度。

⁵ 蘇聯 (1928-1970) 被歸納是一種「成長式的榨取政治制度」。經濟成長是國家政治權力集中帶來的治理能力增強，壟斷權力的政治精英直接分配資源給工業活動的結果。但這種缺乏技術變革的成長，無法達到持續且穩定的成長 (Acemoglu 與 Robinson 著、吳國卿和鄧伯宸譯 2013: 150-157)。

⁶ 中國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開放，被視為是榨取政治與廣納經濟制度的組合，並認為中國現有的成長是一種「追趕」 (catch up) 效應創造的「威權式成長」 (authoritarian growth)。除非政治出現重大改革，不然在缺乏廣納政治制度與創造性破壞之下，無法維持長久性的成長 (吳國卿和鄧伯宸譯 2013: 469-473)。

⁷ 非洲的辛巴威、衣索比亞、剛果、獅子山等；拉丁美洲的瓜地馬拉、哥倫比亞、阿根廷等。

⁸ 包括，資本家、實業家與仕紳階級等新興社會團體的興起。

⁹ 工業革命未發生在當時富裕的西班牙，是因為西班牙王室對大西洋貿易的獨佔權 (1/5進貢)，抑制了財富重分配與新興社會階級的興起，來抵抗王權的擴張。亦

從「廣納政治制度」到「廣納經濟制度」的過程，凸顯權力與政治過程對經濟制度改變的重要性。

反之，當前貧窮的國家，多半是因為採取「榨取政治制度」¹⁰ 與「榨取經濟制度」¹¹ 所致，造成權力與資源集中在少數菁英手中，形成決策上的「寡頭鐵律」。菁英階級害怕廣納制度引進的「創造性破壞」會帶來政治與經濟權力的更迭，而固守「榨取制度」來極大化個人利益。「榨取制度」釋放的誘因是鼓勵奪取資源的政治內鬥，無可避免地陷入另一個榨取政權的「惡性循環」（vicious cycle）。此外，「廣納政治制度」不會支持一個「榨取經濟制度」。因為「政治多元化」會透過立法與經濟領域產生聯結，誘發市場走向更公平的制度。弔詭的是，「榨取政治制度」與「廣納經濟制度」的組合可能帶來成長，卻不一定促成政治改革。中國的「威權式成長」即是一例（Acemoglu與Robinson著、吳國卿和鄧伯宸譯 2013: 460-73）。

今日亞、拉與非洲等貧窮國家採取的榨取制度，被認為是源自殖民歷史，¹² 且在「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下難以突破巢臼。對於

即，西班牙存在「政治集權」，卻無「政治多元化」，後者卻是支撐走向廣納經濟制度的基礎。

¹⁰ 「榨取政治制度」是指政治專制、缺乏政治多元化，權力集中在少數菁英手中，阻礙了對權力擴張的節制，難以催生有利市場發展的法治基礎，例如共產黨、法西斯主義等專制主義。

¹¹ 「榨取經濟制度」是指經濟利益控制在少數菁英手裡，無法廣泛且合理地分配於社會。榨取制度缺乏對私人產權的保障，無法鼓勵民間儲蓄、生產投資與技術創新，容易形成「二元經濟」。

¹² 作者從大西洋貿易與殖民國家入侵開始，說明西班牙在拉美殖民過程強加的勞役制度，是造成榨取經濟制度延續的主因。此外，也強調拉丁美洲在脫離殖民走向獨立以後，政權仍由西班牙白人後裔壟斷，造成政治多元化不足。非洲則因為陷於早

打破惡性循環，兩位作者以非洲的波札那和美國黑奴運動為例，說明「關鍵時期」提供的機會，配合「推動改革的力量」與有利的現行制度之間形成廣泛的「政治聯盟」可打破惡性循環、重建廣納制度（吳國卿等譯 2013: 456）。只是，催生政治聯盟的前提是現行制度內部已存在「政治多元化」。若否，則須透過政治「賦權」（empowerment）過程，培育草根力量的政治參與，以促成「政治多元化」的萌芽。

三、諸神之戰：詮釋的典範爭議

《國家為何會失敗？》自出版以降，引發學界的論戰。主要爭議在於：第一，典範爭議：單一因果論的偏頗？或集理論之大成？；第二，發展是「制度決定論」還是「歷史的偶然」？

第一，關於典範爭議，《國家為何會失敗？》引用了制度論的立場，來反駁地理、文化和無知假說的有效性，遭過於誇大制度解釋力與單一因果論的批評（Diamond 2012）。縱使「制度」的有效性不容否定，但排除其他因素的解釋力被認為是本書最大缺陷。然而，兩位作者以廣納制度建立理論，在比較個案的歷史發展與制度變遷的論證中，隱含同意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張的私有化、市場主導的成長和結構改革的前提，以及制度經濟學對於制度誘因與路徑依賴等觀點。誠如經濟學者Mulligan（2012: 377-378）認為，廣納制度理論背後有著傳統經濟學理論的基礎在支撐，本文同意此一論點。

期供應歐美奴隸販賣的經濟循環，在獨立後，也因為出口咖啡與鑽石的經濟誘因，造成榨取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惡性循環。

該書對於「發展」的本質，似乎隱含支持農業到工業的線性假設和經濟發展階段觀點（Rostow 1971〔1959〕）。¹³ 在論證「廣納制度」時也強調「私人財產權」的誘因，以回應North（1972）¹⁴ 對於產權保障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以及Hernando de Soto（2000）主張缺乏明確的所有權定義與界線，是造成發展落後的主因。在說明「榨取制度」導致國家發展落後時，他們引用「二元經濟」（Lewis 1971〔1954〕）¹⁵ 說明貧窮國家的政治經濟結構之所以落後貧窮的原因，並採納Myrdal（1974）對於發展積累與循環因果關係（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的假設（Mulligan 2012: 377）。

然而，這套理論遭受最大攻擊在於：否定其他假說的有效性。在接受「制度」影響發展的前提下，生物地理學者Diamond（2012）批評該書排除地理因素是過於簡化地理效應所致，並認為經濟學研究早已證實地理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聯性。他引述Jeffrey Sachs（2005）主張：「在熱帶地區因疾病造成技術勞工投入勞動的壽命僅歐美平均值的一半」，

¹³ Rostow（1971〔1959〕）的《經濟成長階段論》（*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依據科技與科學的應用、經濟結構與社會結構等因素，將經濟發展分為五個階段：傳統社會、起飛前社會、起飛社會、邁向成熟社會與大量消費社會。前一階段的滿足，意味下一個發展階段。

¹⁴ North的財產權理論主張，產權是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市場中的產權交易會更有效地促進資源的配置。

¹⁵ Lewis 1971（1954）提出開發中國家是「農業部門大、工業部門小」的二元經濟結構。它們普遍面臨資金短缺與技術落後，但卻擁有廣大且低廉勞動力的無限供應（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優勢，可藉由貿易引進資金與技術。因此，開發中國家可採取「低工資政策」策略，提供大量低廉勞動力來吸引外資，以從小工業部門擴大帶動其他經濟領域的發展。

來支撐地理假說對發展的有效解釋。¹⁶ 本文認為，回歸本書論證的脈絡，兩位作者在解釋英國透過維吉尼亞公司進入北美洲殖民時，無法複製西班牙在南美殖民的榨取模式是因為「北美洲缺乏可掠奪的黃金與貴金屬」（吳國卿等譯 2013: 46）。似乎南、北美洲殖民模式與制度的差異，極有可能是源自於「地理」與當地「現行制度」的交互作用所致。基於此，本書作者並未完全否定地理因素的解釋效力。

除此之外，對照拉美殖民地實施的強制勞動制度限制了「個人自由」，本書作者以英國到澳洲的「移民」獲取「個人自由」，來說明廣納制度的市場效應與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是廣納政治制度帶動廣納經濟制度發展的另一論證。也回應了Sen（1999）從個人自由與能力作為支撐經濟制度架構與經濟發展的基本立場（Mulligan 2012: 378）。¹⁷

本文主張，歷史制度論作為分析架構的背後存在著集理論大成的傾向，至少它促使不同理論觀點之間的對話成為可能。本書最終採取偏重制度論的立場，造成理論的詮釋力備受爭議，雖難逃「制度決定論」批評，但若指稱理論過於單一因果決定論，似又過於沉重。

第二，《國家為何會失敗？》在提出廣納制度的理論下，同時強調「歷史事件的偶然」對制度改變的影響。

¹⁶ Sachs（2005）指出：「熱帶國家的疾病，造成技術勞工的平均壽命只有40歲左右，相較歐美與日本的80歲少了一半。技術勞工在30歲完成職業訓練進入職場後，只剩下十年工作時間可以貢獻生產力。…此外，熱帶地區婦女因需擔負照顧生病小孩責任，阻礙婦女進入勞動市場。」參閱Diamond（2012）。

¹⁷ Sen（1999: 87）認為，貧窮的定義是個人自由與能力的被剝削。自由狀態下的個人能力可以發揮到極大化，就會達到經濟學上的柏拉圖最適效應。

兩位作者強調國家在「關鍵時期」採取不同的回應方式，造成國家之間出現初始制度分歧，這可追溯到歷史特定事件造成的制度改變。¹⁸ 似乎，他們在解釋國家富裕的根源時，除了強調「廣納制度」的經濟影響，也高度依賴歷史偶然來說明制度的出現，亦即「隨機」歷史事件的「運氣」（Jha 2012: 168-169）所創造的「關鍵時期」與「制度漂移」的交互作用，造成制度變遷的契機。看似，本書跳脫了「制度決定論」的框架，並指向歷史的開放性與非命定性，但在過於強調歷史事件的「偶然」作為驅動制度改變的轉折點時，也造成理論的不確定性大增，因此無可避免地降低了這套理論對於國家發展路徑的預測力（Vuković 2012: 323-327）。究竟，「制度決定論」與「歷史的偶然」之間是否是一種「兩律悖反」（antinomies）？

在「歷史的偶然」之外，本書作者指出大西洋貿易作為「關鍵時期」開啓了殖民母國在貧窮國家建立的榨取制度。依照理論邏輯，一旦榨取制度被建立，這套制度就會產生自我強化的韌性，使國家陷入持續性的「惡性循環」，直到下一個「關鍵時期」再次釋放改革契機。但是，關鍵時期經常是「偶發」的。這如同是說榨取制度在第一時間出現就很難校正。隱含「路徑依賴」之下產生的「鎖定」（lock-in）效果，因此有強烈的「制度決定論」的傾向。

此外，本書也提到，歷史偶發的「關鍵時期」提供了榨取制度走向廣納制度的改變契機，開啓制度「改變」的機制在於：「關鍵時期加上推動改革力量與有利的現行制度所形成的廣泛聯盟，在一個國家邁

¹⁸ 歷史事件促成「關鍵時期」的制度改革契機，包括，1346年歐洲爆發的「黑死病」，造成東歐走向第二次農奴制度，西歐走向對勞工更開放的廣納制度；其次，1492年開啓的「大西洋貿易」，再次造成西歐的西班牙與法國走向王權專制的鞏固，英國則因大西洋貿易興起的資本家與實業家進入國會，強化對抗王權的代議力量，並促成行政與立法的制衡機制，廣納政治制度也誘發經濟制度走向廣納。

向廣納制度過程是不可或缺」(吳國卿等譯 2013: 456)。這意味著，「關鍵時期」開啓的改革機會經常是機遇問題，不可預測性高。且「改革力量」與「現行制度互動」的匯合，仰賴社會先形成廣泛的「政治聯盟」，這隱含訴諸於「權力」的政治過程，似乎必須滿足集體行動的邏輯(Olson 1989)。¹⁹亦即，不斷地謀合偶然釋放的改革機會與集體政治運動的邏輯。

本文認為，以「帝國主義入侵」作為國家「榨取制度」的開端時，殖民的「制度遺產」早已決定了制度發展的軌道。縱使本書提出打破「惡性循環」的機制，但制度的「自我強化」會形塑榨取制度的再製。加上制度改變契機仰賴「關鍵時期」提供的機會，必需配合改革力量和政治聯盟的匯合，這些改革前提對於政治結構是專制集權、缺乏政治參與、社會貧富不均的國家，無疑是捕捉歷史中的一抹偶然與運氣。被殖民國家的貧窮落後，在於國內榨取與殖民列強支配的「雙重鑲嵌」去支撐這個榨取制度的延續。若以制度論來理解，倘若殖民事件的發生是先於其他事件，那麼時間序列已經決定了「路徑依賴」的強度，並將制度「鎖定」在相對穩定的榨取制度，更不利於貧窮國家的發展突破。故本文主張，考量「事件發展序列」，本書更傾向「制度決定論」、而不那麼「歷史的偶然」。至少，「制度決定論」更適合解釋貧窮國家的落後。

四、社會學的對話

人類發展的處境與現況，某種程度上取決於制度建構下的結構化空

¹⁹ 對抗專制政權的政治聯盟作為制度改革的手段，隱含支持政治團體的組織動員與權力競逐。

間場域。制度的歷史面，決定了日後國家發展的軌道，制度的類型也決定了政治經濟領域的參與、生產投資與經濟表現。本書在制度論的宏觀結構下，聯結了微觀的個人互動。然而，在制度相對穩定之下，制度改變指向一個政治過程，需要推動改革力量與現行制度之間所形成的政治聯盟，實屬不易。

《國家為何會失敗？》從歷史制度論出發，在引證與論述過程中也透露出本書兩位作者對產權私有、市場主導的成長與法治等概念的認同。看似他們的理念接近新古典經濟、新自由主義對於「發展是市場主導的成長」假設，以及用「結構改革」作為促進發展手段的前提，這是廣納制度論的基礎。弔詭的是，他們對於廣納制度對應的具體制度架構，包括私有產權與投資的保障，都難以解釋今日獨裁中國與非民主新加坡亮眼的經濟表現與持續成長。²⁰ 本書也揭露了殖民主義強加在貧窮國家的「榨取制度」，並隱含認為這是造成貧窮國家陷入「惡性循環」的「制度遺產」。

總結上述，在發展社會學面臨典範危機，而且大論述無法提供適當的詮釋架構去有效理解社會發展之間的差異時（Portes and Kincaid 1989），《國家為何會失敗？》指出了制度建構與行動者取向（actor-oriented）互動的重要性，同時指出國家無法只以產業政策來突破發展困境，國家能力必須以制度誘因、政治過程以及個人政治「賦權」去建構廣納政治與經濟制度，因此本書的最大貢獻，在於結合歷史制度論去擴充國家能力的界定。但不可否認，本書最大缺憾，在於說明殖民支配史在貧窮國家建立榨取型制度的長期影響時，卻避而不談殖民國家的歷史責任，也逃避早已處於廣納政治經濟制度下的歐美國家，如何引發全球

²⁰ 中國，視國家的利益需要，可以侵犯私人投資與產權，保障私有產權的法律條文只具形式；新加坡的政治權力至今未廣泛的被社會群體所分享。

金融風暴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問題？甚至避而不談歐洲國家為何在二十世紀末趕不上亞洲國家的經濟生產力？似乎，《國家為何會失敗？》的思考不僅是西方中心，也呈現制度決定論的缺失。

該書的優點之一，促使發展社會學開啓不同學科觀點之間的對話，關注內部政治制度發展的方向（Portes 1997; Pieterse 2012），強調制度與政治、經濟體系之間的「鑲嵌」性（Evans 2005: 90-105）。²¹ 未來，在分析打破「惡性循環」的微觀行動者導向時，必需更重視歷史情境、社會規範的非正式制度與社會心理的互動過程（Nee and Ingram 1998），這與社會學產生更強烈的聯結。基於此，發展社會學不僅要做歷史關鍵時期宏觀制度的分析，同時要觀察與微觀行動者互動所引發的制度變遷，來解釋不同國家發展之間的變異，這是政治、經濟與社會分析的科際整合，因此學科之間的知識創新與整合，重於學科內部的閉門造車。

作者簡介

劉雅靈，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興趣為後社會主義國家轉型，以及開發中國家政治經濟發展。近期研究包括中國區域經濟轉型、農村財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資本主義類型比較等。

黃富娟，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所博士候選人。研究興趣為發展社會學、經濟社會學、國家與社會關係。特別是對於東亞與拉美區域的比較發展研究。

²¹ 說明制度轉向的觀點，以挑戰經濟學主張貧窮國家要走出低度發展首要之務是資本積累（Evans 2005: 91-92）。

參考書目

- Acemoglu, Daron, Robinson, James 著、吳國卿 / 鄧伯宸譯，2013，
《國家為什麼失敗：權力、富裕與貧窮的根源》。台北：衛城
出版。（Acemoglu, Daron, Robinson, James,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Olson, Mancur 著、董安琪譯，1989，《集體行動的邏輯》。台北：遠
流出版事業。（Olson, Mancur 1971, *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Acemoglu, Darson, and Robinson, James, 2011.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Morishima Lecture
at LSE*, June 8, 2011. Available at [http://www.lse.ac.uk/assets/
richmedia/channels/publicLecturesAndEvents/slides/20110608_1830_
whyNationsFail_sl.pdf](http://www.lse.ac.uk/assets/richmedia/channels/publicLecturesAndEvents/slides/20110608_1830_whyNationsFail_sl.pdf)
- ,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 De Soto, Hernando,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New York: Basic Books.
- Diamond, Jared, 2012, “What Makes Countries Rich or Poo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the Book*. June 7.
- Evans, Peter, 2005, “The Challenge of the Institutional Turn: New
Interdisciplinary Opportunities in Development Studies.” Pp. 90-116 in
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Victor Nee & Richard

Swedberg.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all, Peter A. and David Soskice. 2001, "An Introduction to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Pp. 1-68 in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edited by Hall and Sosk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ha, Himanshu, 2012, "Review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29(2): 168-170.

Lewis, W. A., 1971[1954],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 Pp. 400-449 in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edited by A. N. Agarwala and S. P. Sing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yrdal, Gunnar, 1974, "What i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8(4): 729-36.

Mulligan, Gordon, 2012, "Book Review: Why Nations Fail."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26(4): 377-378.

Nee, Victor and Paul Ingram, 1998, "Embeddedness and Beyond: Institutions Exchange and Social Structure." Pp. 19-45 in *The New Institutionalism in Sociology*, edited by Mary C. Brinton and Victor Ne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North, Douglass, Robert, P, 1972,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ortes, Alejandro, 1997, "Neoliberalism and the Sociology of Development: Emerging Trends and Unanticipated Facts." Pp. 353-372 in *From Modernization to Globalization: Perspectives 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UK: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Portes, Alejandro, and Douglas Kincaid. 1989, "Sociology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90s: Critical Challenges and Empirical Trends.” *Sociology Forum* 4: 479-503.

Pieterse, Jan Nederveen, 2010, *Development Theory: Deconstructions/Reconstruction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Ltd.

Rostow, W. W., 1971[1959],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achs, Jeffrey, 2005, *The End of Poverty: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Times*. USA: Penguin Press.

Sen, Amartya, 1999, *Development as Freedom*. USA: Anchor Book.

Vuković, Vuk, 2012,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Finan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36(3): 321-328.